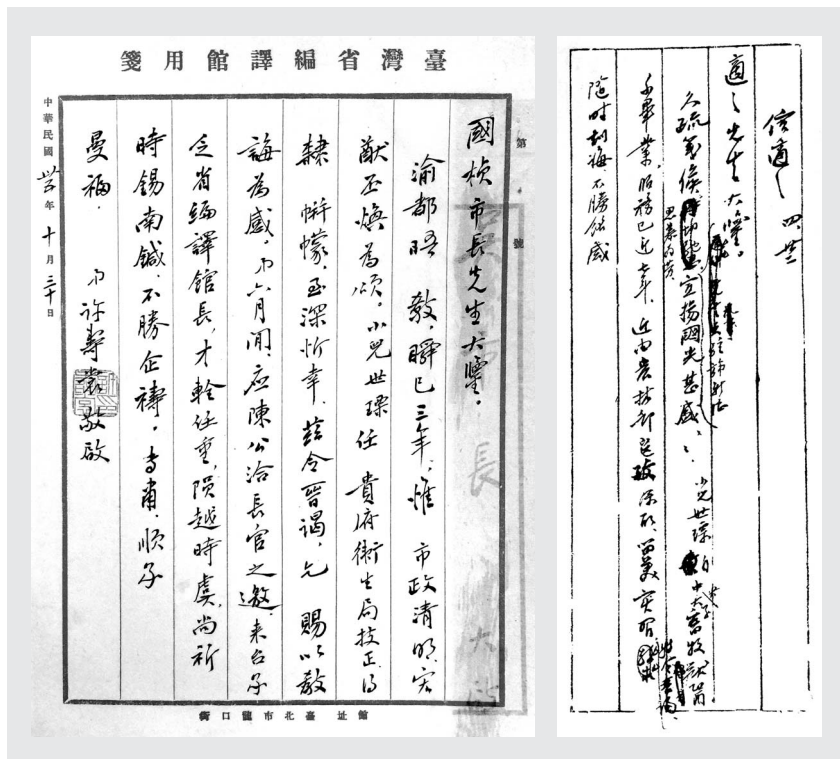


# 长夜凭谁叩晓钟

## ——许寿裳尺牍



所以许寿裳的书法时常也会像鲁迅一样，运用一二个古字，自然有机地掺杂其间。不过我以为，许寿裳在写字上应该没受到鲁迅的多少影响，而是大有蔡元培先生的书法之风。因为许寿裳长期追随蔡元培先生，蔡筹建教育部，他先后在其手下任金事、科长、参事和司长；一九二七年蔡元培创办大学院(即以后的中央研究院)，他又应邀出任秘书长、秘书处主任等，为蔡先生起草文件，代撰诗文或是代写题辞贺联等，都是常事。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故细观许寿裳之书，其字结体左低右高，笔画舒展，长横长撇长捺颇多，这些都是蔡元培书法的特点，也许不知不觉中，书风也就趋同相近了。

在“家藏书信集”中，有一通致胡适先生的书信手稿，颇引起我的注意。因为许寿裳与胡适平日的往还极少，他们本就不属同一个“朋友圈”。此信写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大鉴：  
久疏笺候，思慕为劳，驻旆新征，宣扬国光，甚盛甚盛。小儿世璠自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服务已近七年，近由农林部选考录取，留美实习，特令晋谒，随时训诲，不胜铭感。

原来这是一封私信。许寿裳的次子，毕业于中央大学的许世璠，生于一九一六年，时值三十来岁，风华正茂，有幸公派去美国实习一年。而胡适此时正于中国驻美大使的任上，故许寿裳写此一信，令儿子持函去拜见一下也属正常。查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的三厚册《胡适往来书信集》中，不仅未见此信，也未见许寿裳与胡适的其他往来书信。当然，书信集中“未见此信”也很正常，有两种可能，一是此信遗失未收，还有一种是许寿裳虽写了此信，但许世璠或因种种原因并未去“晋谒”，此种例子很常见，做老爸的往往不放心，千叮万嘱万关照，做儿子的却“阳奉阴违”，并不当回事。

《许寿裳家藏书信集》中有不少是写给儿女的信，颇多关切殷殷之情。对长子许世璠似多信任和依傍，而对次子许世璠，则明显不放心，叮嘱教诲尤多。譬如在美国实习期间，世璠告诉老父说他课余时间热衷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文化之事，许寿裳闻之大怒，回信告诫云：“你来信屡说宣传宣传，自是热心，但要晓得这不是你本分以内的事，我前信已劝你不必做。政府派你去实习，不是教你去宣传。况且你说宣传中国文化，谈何容易！中国文化你根本没有研究过，所宣传的就不能中肯策。……总之，你的本分是实习，及时求学。一年时光至短，转瞬即逝，稍纵即逝，务望你坚守自己岗位，切勿分心旁骛！”

为父的观点还真没错，试想你一个畜牧兽医专业的，

千里迢迢来美国仅一年的学习时间，还真不适合再分心热衷于其他事情。后来世璠爱上美国女孩，想延长学业并与美国姑娘结婚，老父又有一信几近于训斥，说世璠写给某教授的英文信甚不得体，英文也不佳，还托钱次长转交，“必为钱次长所笑，甚至怒。”世璠还有一些不太妥当的求托之信，想让父亲帮忙为之转交某某次长或校长，许寿裳均认为不妥而拒绝。并斥之“愚极！”另外，关于恋爱结婚的事也告诫其“你的职位月薪，决不能与美国女子结婚，望勿凶莽，自陷伊戚，后悔莫及！”

许寿裳事业繁重，但对子女的关爱教育从未懈怠，尤其是对许世璠照拂可谓殚精竭虑。说来正巧，上海档案馆的馆藏书信中，也有一通许寿裳致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尺牍，一读，又是为儿子许世璠的事所书：

渝部晤教，瞬已三年，惟市政清明，宏猷丕焕为颂。小儿世璠任贵府卫生局技正，得蒙怜察，至深忻幸，兹令晋谒，乞赐以教诲为感。省六月间，应陈公洽长官之邀，来台承乏省编译馆长，才轻任重，陨越

时度，尚祈时锡南针，不胜企禱。专肃，顺承  
曼福

弟许寿裳敬启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月三十日

此函的目的与给胡适的那个类似，皆属礼节性的特函“晋谒”。这也是过去的一种规矩，年轻人到一个新地方谋职或办事，人生地不熟，长辈仗仗着故交关系，为之操翰介绍，令其拜访一下当地的权贵大佬，虽说是“乞赐以教诲”或“望随时训诲”云云，其实都是希给予照应帮助之意，这是中国文人间的传统“套路”，彼此都懂。

吴国桢曾任重庆市长，而许寿裳一九四一年调至重庆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故有“渝部晤教，瞬已三年”之客套语。吴国桢是留美的博士，长期周旋于政治和官场，而许寿裳属留日系，始终服务于教育界，应该说，吴、许之间交往并不会多，只能算是相识而已。但为了儿子，许寿裳致函问候期以拜托似也在情理之中。

此函许寿裳写于台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台岛，派“留日系”人物陈仪赴台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这位陈仪，字公洽，与许寿裳私谊甚好，据说原本欲邀请许寿裳来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结果遭到南京教育部的反对，于是陈仪改设编译馆，请许寿裳任省立编译馆馆长。编译馆直接隶属于行政长官公署的机构，承担着战后台湾文化重建的重任。由此可见陈长官对许寿裳先生的器重。

但世事难料，有时还正是所谓“福兮祸所伏”。许寿裳受邀赴台担当文化复兴之重任，本来应是好事，但随着陈仪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以及政治上互相倾轧被调离后，台省编译馆成立不到一年也被撤销。后许寿裳受聘台湾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正欲重整旗鼓，再有所作为时，不幸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的晚上，突然于家中被凶匪的柴刀所害。尽管此案发生后不日即告侦破，凶手系谋财害命而伏法。然事实真相远非如此简单，据多位史家研究猜想，许寿裳先生的遇害，应该是一场政治谋杀，这与许寿裳的左派思想以及他与鲁迅特殊的关系或有关联，而鲁迅正是国民党右派所忌恨的人物之一。只是所有种种，也只是猜测，并无铁证的史料公布，故许寿裳的真实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我想起鲁迅先生逝世后，许寿裳曾有一首《哭鲁迅墓》诗云：“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峰。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读来颇令人痛惜怅惋，潸然泪下。此后二句，若以之形容许寿裳先生自己，似也同样可以担当。

1月9日至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开明画院举办了“印中乾坤——首届海上小刀会篆刻作品展”。一位观众这样评价：这是一个“自画像”的展览。说展览的前言是自己撰写；展览的布置是自己动手；展览的作品是八位作者各自提供的三幅印屏、五方原石和两幅书法作品，尤其是“小刀会”集体创作的八个主题印屏的亮相，更是组成了这个团队的“自画像”。有点意思！不过，“自画像”展览之说，笔者还是第一次听到，呵呵！

说到“自画像”，又让笔者想到了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凡高，凡高一生创作了三十多幅自画像，虽然表现手法各异，但人们依然认为这还是凡高。凡高说“同一个人有多样的自画像，与其追求照相般的相似性，不如深入地发掘相似处。”由此，笔者以为不管你是对着镜子画，还是拿着照片画；是从正面表现，还是从侧面展示，关键问题是要画得像，就是速写，那几根线条也得勾画出人的动态或静态的形象来。笔者应为这位观众点个赞，点赞的目的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展览名词，而是他给当下的展览提供了一个思考。“自画像”的展览就是要像自己的展览，真正体现出作者的艺术风格与个性追求。

记得展览当日，“海上小刀会”展览的前言同时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全文刊出，当然，给展览增添了几分光环。提起“前言”，做个展览的都知道，撰写“前言”是一件“头疼”的事情，如果自己能自己写“前言”可能就更“头疼”了。回顾一下我们曾步入过的展厅，会发现有不少展览前言是邀请什么“家”，什么“腕”撰写的，有时为了展览，花点银子也值。另外，邀请他人撰写前言拔高一点，说上几句铿锵有力的话，观众也不觉为怪，最多笑笑而已罢了。但是，如果自己给自己写前言就不一样了，这是在给自己“自画像”，拔高了，别人会笑，写低了，内心委屈，那只有正视自己、评价自己、解剖自己。这次“海上小刀会”展览前言能够得到观众的关注，说明这个活动是成功的，这也是观众对“海上小刀会”自画像的褒奖与认可。

“自画像”也是有艺术基准的，可能需要底色，需要构图，需要透视。笔者觉得“自画像”不仅要画像，还应应对展览的审美取向与艺术价值有一个正确判断和描述，就像凡高所言“深入地发掘相似处”。与此，笔者左思右想，感到还是有必要抄上几句此次展览的前言，让忠实的读者看看评评。“前言”说，举行此届展览“既作消寒之雅集，以舒怀旧情怀；又乐同道佳客，相与赏石论印。”可谓道出了“海上小刀会”办展的想法。“前言”又说：“海上小刀会八友效仿近代民间书画雅集，追求独立、平等、自由、快乐的艺术创作氛围。为避免因人事安排引发的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之弊，不设会长、秘书长等职务，凡事集体商议，群策群力，畅所欲言，一旦确定目标，各行其职，皆勇于担当。小刀会八友性情相契，不整名利。”“凡聚会切磋，既无需请个人观点，也充分尊重对方的艺术追求，以祈共同提高。”这段表态笔者就无需诠释了，是立志还是寻觅？你懂的！总之，“前言”的表述既直接又客观，正如一位读者阅读了《新民晚报》刊登的“前言”后的留言：读罢前言，感触良多，掏心掏肺，期望正道，面对艺术，不忘初心。不过，也有人对于“小刀会”的称呼比较敏感，可能是想多了。

此次展览，在形式上“海上小刀会”也动足了脑筋，给观众留下难忘印象。来自山东的观众说：此次展览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这样的展览怎么不举办开幕式，邀请领导讲话，还无会标、无花篮；二是没有想到八位作者当上了展览“解说员”，与观众一同谈艺赏印、互动创作生趣。来自江苏的观众说：“海上小刀会”展览有一种清风徐来，感到这是一种新的展览形式——温度观看，观众与作者在同一平台进行探讨与交流。

唉！新年首篇，笔者就闲话“海上小刀会”，是不是有点自卖自夸了？不管怎样，笔者还是要特别感谢那两位朋友，是因为他们的审美视角和“创造”的名词——“自画像”和“温度观看”，才使笔者有理由在此闲扯，至于这两个名词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不过，“印中乾坤——首届海上小刀会篆刻作品展”还在继续，上海交通大学只是“海上小刀会”走进高校，传播弘扬中国篆刻艺术公益巡展活动的第一站，让我们在下一站相见吧！

# 「海上小刀会」自画像

简斋

简斋闲语

江倒海之势。在学北碑的诸家之中，就这一点已经超过别人而自立门户，雄视书坛，光辉万丈，是见者惊叹不已。”

中年以后，于右任又转入草书书法的创作阶段。纵观于草，绝大多数为字字独立，偶有连笔二三字的，但气势博大雄伟而带狂意，点画质朴而富有动感，劲骨且似草章，厚实凝重而又流畅洒脱，拙巧合二为一，将大草、小草与草书熔为一炉，营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于草给人的视觉颇有速度感，似乎是挥笔疾飞，但仔细观察，即又处处可见留驻之迹，形成体圆笔方的艺术形象，这与他的碑体楷书之体方笔圆，恰巧合成鲜明的对比。试观他晚年书写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神灵如飞的速度，与笔笔似弯钢、“发条”的力度，交融一体，变化多端，意象万千，十分耐看，构成了独特的风格，艺术性极为丰富，调和了各种似相矛盾而又辩证统一的书法审美成分。同时，他刻意追求文字书写的削繁就简，以至把草书逐步简化到似乎不能再简的程度，这一特点又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于草强调以富于变化和形断意连的“应接”来表现巧丽、浓烈的一面。他对东晋以来风行的一字草“和明清时盛行的“连绵草”，则取其理而摒其语。申明：“威而不猛，亦是发人深省。盖媚如无骨，与夫剑拔弩张，俱失之也。”故“威而不猛”实为于氏书法最为鲜明的个性风格，以此观赏其书法的点画形象和艺术意象，方能品得其味。其结字虽不见猛烈强悍，却能显示出威力无比。观赏他的行、草大字对联与榜书牌匾，气势磅礴，宏伟雄强，极富立体感，如苍莽崑崙横空出世，使人人为之震撼！于右任的原本深厚的北魏书创作功力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用笔习惯，反成为阻碍他达到理想境界的一种羁绊，使得他在对传统草书创作试图进一步深入时，往往抉择不定，举措两难。

王德彦

# 海派书家掀谭(九)——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年)，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的职业生涯是从上海开始的，而且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于右任长期生活在上海。1932年起他就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之职后，基本生活在南京了。1949年，违心赴台，滞留孤岛。

对于于右任与上海的关系，书坛乐道的是“标准草书社”。1929年，于右任开始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邀集一批同仁开展了前无古人的草书标准化研究工作，他们是：“三原于右任，泾阳周伯敏，吴江杨天骥，鹿原刘海天，巩县刘延涛，洛阳曹明为，蓝田李生芳，盐城胡公石，长安李祥麟”，并创办了《草书月刊》。当时，大书法家沈尹默对此举也饶有兴致，常去上海静安寺社址参与探讨，并有《题于右任〈标准草书〉歌》赞曰：“高论尝闻静安寺，整齐百体刚草字。美观适用兼有之，用心大与寻常异。”

对于上海来说，于右任比创办“标准草书社”更重要的是在危难中办报和办学。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办于右任。于的亲友听到消息，以重金雇人去开封，向正在那里参加会试的于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的公文反比于右任的家信晚到，于右任得以迅速逃离开封到上海，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1907年起于右任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0年与宋教仁等在沪又创办《民立报》。1904年于右任入

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化名刘学裕。入学不久，震旦学院主管教务的法籍神甫乘马相伯生病之机，企图使震旦为教会所把持。马相伯愤而辞职，学生相率离校。为解决离校学生的求学问题，于右任出钱，出关系并聘用马相伯、叶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筹组复旦公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秋节正式开学。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解体，当年8月于右任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陕事经过，并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于右任与邵力子等人创办上海大学，并被推举为校长。瞿秋白(社会学系主任)、郭沫若、蔡和森、邓中夏(教务长)、恽代英、沈雁冰、肖楚女、陈望道(中国文学系主任)、张太雷等均在该校任教，因此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1922年11月爱因斯坦访沪时，于右任即以上海大学校长的身份作陪并致辞。

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大体可分两个阶段：一是他潜心魏碑，二是他创立“标准草书社”。于右任早年学书法从赵孟頫入手。赵孟頫的字圆润流丽，气息甜熟，加之又以宋朝宗室的身份供奉于元朝，“贰臣”之举，大节有亏，所以其字也被书法界人士所诟病。于右任先生在经历一段临习后，力矫其弊，刻意去学习粗犷豪放、变化多端的魏碑，一变唐楷规矩刻板之风。为了研习，他广为搜求魏碑石刻，几十年下来，所收书碑，蔚为大观。因所收碑刻中有七对是夫妻合葬墓志，就将自己的高号名为“鸳鸯七志斋”，可见对魏碑爱之深刻。可以

墨苑传奇百年(十二)

进博物馆,意味着结束还是加速

我们俗话说：“快进博物馆了”，其指老旧的快要淘汰的意思。在老百姓眼里，博物馆收藏的尽是历朝各代文物古董，因而人们形成定见，认为进博物馆就意味着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时代发展，博物馆业的涵盖面越来越广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仅在上海，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就有近二百家，而民间收藏馆、陈列室更不胜枚举。现在的博物馆不再局限于博“古物”，而在于博“万物”，如当代艺术博物馆、地铁博物馆、航天博物馆等……由于对文化的重视，几乎各门类、各行业、各院校都建有自己的博物馆。

上海笔墨博物应运而生，它于2005年筹建，2008年开馆。当时筹建行业博物馆的一些单位几乎都是由市局转制的集团公司，如烟草、纺织、银行、邮政、电影等，笔墨业无法与其相比。就有人认为，笔墨业境况并不宽裕，把钱花在这种不出经济效益的地方，可别真把自己“办进了博物馆”。但当时企业领导决心坚定，又得到区政府和上级集团的支持，硬是承受艰难、顶着风险办了起来。如今博物馆办得还较成功，社会公众、领导专家给予予以充分认可和好评，企业也从中获益匪浅。

曹素功墨业几百年的历史史料被藏入了笔墨博物馆中，静静地躺在展厅中，将他的历史兴盛、向参观者娓娓道来。同样的，馆中还收藏着制笔老字号周虎臣的那段历史。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过程中，博物馆的功效显明凸现出来了。区、市、国家非遗评审组专家、主管审批的部领导，参观了笔墨博物馆，在这里看到了企业发展历程，脉络清晰，源远流长；看到笔墨的制作，技艺精到，薪火永续；看到笔墨文化内涵底蕴深邃厚重；更看到海派特色，发展创新，与时俱进，于是评审顺利过关。(下转2-3版中缝)